



背影

■郑茂琦

说到十八军,想起一支特殊的队伍。这支队伍多是十七八岁的女战士,她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赶牦牛将粮食和物资送往前线。起初,她们热情很高,兴趣也很大,总想将牦牛赶得快一点。谁知道第一天没有走出十里路,牦牛就漫山遍野放了“羊”,一下子跑散了很多头。这可真是难住了她们。原来,牦牛很不好赶。藏胞懂得牦牛的习性,也有经验,牦牛见到他们就比较老实。遇到女战士,又是生人,牦牛就调皮不听话了。有的牦牛在路上老是蹦来跳去,如果它背上装米的口袋漏了,它就一直跳到米漏完为止,把赶牦牛的女同志急得直哭。后来,战士们只得求救藏胞,照着他们的办法做,牦牛才渐渐听招呼了,队伍走得也快了。

这个故事,如果听作家杨晓敏笔下的高原女军医去讲,可能还会更加生动有趣。然而,艰苦卓绝的老西藏精神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孕育出来的。于人生而言,当时向变成记忆的时候,装着苦痛的土壤,也会绽放出一朵朵像梦一样美丽的花。在女军医看来,花瓣上会烙着战友们的影像,封存着他们最青春的气息。

今年的冬日,又将有一批战友向军营挥手告别。亲爱的战友,落雪的时候,也掩不住你远去的背影。因为,你永远在我心里……希望这组与“退伍”有关的故事,能化为一簇簇火焰,把温暖传递到海角天涯。

本版插图:李晓林
插图制作:贾国梁

名家讲述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采访手记。当部队医院宣布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,她刚20岁。

她是当年扛着背包一路翻山越岭来到西藏的。现在的人们把这些人称为十八军老战士。“十八军”的概念实际上已超越了它所代表的部队番号的含义,上升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符号与荣誉。那年我去采访的时候,仍在西藏部队服役的十八军老战士已屈指可数。然而就在那所高海拔的野战医院,我竟意外地遇见这位即将离藏的十八军老战士。

女军医两鬓染白。她告诉我,她已经办好了离休手续,明天就“下山”了。我暗自庆幸。

或许是一种很微妙复杂的原因吧,女军医对我要采访的那些问题,总是有意岔开话题,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说,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,几十年待在这里是因为工作需要;医生本来就是为病人治病的,算不上什么奉献,所干的都是份内的事,仅此而已,完全没有必要在报上给予宣传。正当我琢磨怎样让她打开话匣子时,她想了想说:“你陪我在营区转转吧。”

医院的建筑整齐划一,铁皮房子大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。病房的左侧有一大片林卡(林卡是藏语,意为园林)。白杨树拔地而起,笔直高大,白亮的躯干在冬日灼射下,丝毫没有呈现出被寒风肃杀的景象,依旧挺精神的。它们酷似一大群身着白大褂的俊俏昂扬的护士。我们在林中漫步。脚下是发出嚓嚓脆响的叶子。野鸽子静卧在光秃秃的枝条上,气氛极是和谐。女军医沉吟片刻,说:“给你讲这林卡的历史吧。”

“医院刚搬来那年,这里蒿草遍地,乱石成堆。对于这个只有野狗出没的不毛之地,我心里实在产生不出愉快的感觉。我们匆忙地架起帐篷,边防上的病号便陆续来住院了。记得第一次上夜班时,我惴惴不安地举着马灯走出帐篷,就撞见一只狐狸从我脚下窜过,吓得我连马灯都扔了。”

“后来工作基本转入正常,医院考虑修建房子。我们几个年轻人憧憬起未来,觉得生活太单调枯燥了,应该有点别的什么。那时我们也在恋爱,你别说笑话,当时连个说悄悄话的地方都难找。每顶帐篷里都住着七八个人,外面一片荒凉,也没有个遮挡的地方。五十

年代谈恋爱和谈工作差不多,远没有今天的年轻人开放。我心想,这里能出现一大片林卡该多好,阳光下的叶子洒满金黄,林中铺着厚厚的草坪,我们可以

在里面唱歌、跳舞,甚至和恋人待在某一处密密匝匝的树荫里……”

“我们开始栽树了。刨开乱石,填进泥土,小心翼翼地栽下了幼苗。你瞧,这些高大粗壮的树便是当年我们最早的劳动成果。高原确实不易栽树,浇下一桶水,吱溜几下就让干涸的乱石滩吸干了。没有自来水,浇树全凭我们到前面的雅鲁藏布江去挑。肩头磨出茧了,腰杆也由S形变成水桶状了。说句笑话,五十年代找对象并不注重身材如何,要是今天可就糟了。第一年栽下的树苗死去三分之二,只有一小部分绽出新芽,长出绿叶。我们正处在富于幻想的青春年华,那年初秋高兴高,极小的林卡成为我们娱乐的好去处。风儿一吹,叶片像小风车一般旋转不停,我们翩翩起舞,忘记了一切烦恼疲劳。”

“次年春天,我们提心吊胆,生怕高原严寒的冬季会扼杀掉已经成活的幼苗。随着气温逐渐升高,担心解除了,白杨树熬风斗雪,又显示出蓬勃的生机。其实在西藏高原上栽下的树,一旦成活,生命力是异常旺盛的。是我们产生出这样一个心愿,一定要栽培出一大片的林卡,让它们与我们高原军人的青春同步。直至今日,营区内栽树活动仍是医院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。我们年复一年地刨坑栽树,挑水浇灌,林卡不断扩大。我们也陶醉在劳动创造的甘甜之中,一度忘却了当初关于在林中谈恋爱的憧憬。闲暇无聊时,大家只偶尔在林中散散步。”

“八十年代后的情况则不同了。那些年年从内地军医学院分来的年轻人,叹息之余,终于发现了这大片林卡的价值。每当夏秋两季,夕阳斜射,林卡里弥漫着欢歌笑语。她们怀抱吉他,甩动长发,旋转起高跟鞋,在林草中不停地唱呀、跳呀。节假日时,月上枝头尚不肯罢休,似乎她们本来就是林卡的主人翁。我们早已过了唱歌跳舞的年龄,这时哪敢插足其中?但林卡是我们栽的,对此仍然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在一个明月清风的夜晚,我怀着好奇心悄然走进林卡。”

“斑驳的月辉从叶子的缝隙中透进来,踩着酥软藏藜的草地,令人心旷神怡,沉浸在一久久违的惬意的暖流之中,我恍觉第一次领悟到林卡的魅力所在。可当我四处张望时,顿觉面红耳赤,不合时宜。树干粗大的阴影里,几对情侣隐绰地依偎着,正在呢喃

低语。我的出现,似乎干扰了这静谧、恬淡的氛围……我茫然后立即清醒,这时刻的林卡是属于年轻人的,而我老了。”

“其实我的心并不老,但我不能赌这种气,否则姑娘们会笑话我呢。当年栽树,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个栖身的休闲娱乐场所吗?现在自己早到了当祖母的年龄,今非昔比了!以后我决不再轻易到林卡里去,只远远地望着它,默默地放飞心中的想象,唤起久远的回忆。树都长大了,也说明我们在西藏几十年是值得的嘛。”

“前些天宣布我离休时,组织上问我有什么要求,我想了半天,说那就把欢送会放在林卡里开吧。姑娘们都说我的要求提得太好了。开欢送会的头天晚上,我失眠得厉害,心想要离开西藏了,明天能在自己亲手栽培的林卡里度过,一定要玩个痛快,和年轻人捉迷藏,击鼓传花,还要跳舞,重温自己青春的梦幻。总之,那天晚上想了许多……”

“我至今都认为,那天是我倒霉的一天。连日来都是晴朗无风的天气,却从那天清晨呼呼地刮起风来,搅得天地昏黄一团。姑娘们懊恼地紧锁眉头。我临窗眺望,禁不住泪珠涟涟。院领导把欢送会的工作都准备好了,我不能要求更改日期,再说情绪已经如此,下次未必就能调动起来。欢送会改在会议室进行。我沮丧极了,以至在欢送会上,同志们还以为我只是对对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西藏高原恋恋不舍呢。”

“欢送会开完后,我裹进大风里,信步走进这片林卡。我恍惚觉得世界静止了,天地明净,只顾贪婪地抚摸着蓬蓬勃勃的白杨树,就像抚摸着我的孩子们一样。心想,今生今世,恐怕再也忘不掉它们了。”

我把女军医的话,全部记在采访本上。



作者小记

杨晓敏 河北藁嘉人,当代作家、评论家。著有《小小说是平民艺术》《当代小小说百家论》《冬季》等。

二医院俱乐部主任。1937年10月,经上级考察任命,走上了延安特区妇女干部学校党支部书记的岗位。期间,组织帮助公公婆婆再次相见,很快他们就结婚成家了。婆婆在延安期间生下的大姐,乳名叫“四省妹”,后来在行军作战中生病死夭折了。”

我问:“他们是什么时候退伍的?”

老人说:“应该是抗战初期,当时也是响应党的‘精兵简政’号召。那时,父亲的伤腿因救治不及时已致残。家中的奶奶也因父亲参军后没有音讯,哭瞎了双眼,生活无法自理。父亲反复考虑后,含泪离开部队,带着母亲回到家乡古城。当时古城还属于白区。父亲回家后,继续参加地方革命工作。”

老人的妻子继续讲道:“婆婆说自己那时真舍不得离开部队,忠孝难两全,思想斗争很痛苦,每天都流眼泪。但是公公的腿残废了,他们还是选择回家照料双目失明的奶奶。”

我慢慢了解到后面的故事。刚回乡时,他们像是初来乍到的新居民,找不到住处。但是曾经心怀革命激情的他们还是对生活报以热情,在老祠堂的厢房里用几块木板搭了个床铺,铺展开新的生活。伍桂盛白天在山上开荒地,暗中组织当地的地下党员开展秘密活动。张仕南是外省人,慢慢学着耕田种地,操持家务。不幸的是,伍桂盛去世早,张仕南一生坎坷,但她从不求名、不求利,只对自己老红军、老共产党员的名分十分看重。

老夫妇精心保存着父母亲的部分遗物,由于文物原件早年由政府部门统一征集上交,老人特地去复制了一套资料照片。这些照片中,有抗战伤员证,有三等抗日布质奖章,还有那张吸引我来采访的合影。

采访结束,回到家中,我彻夜难眠。我脑海中想象着他们携手穿过硝烟时的泪容,于是提笔写下一句诗词:“烽火征程雁双飞,岁月长空留真情。”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话务兵

■纪钰莹

张校将扼紧的中指贴住迷彩裤缝,屋内挤满她们十个同年兵,只有那盏孤零零的白炽灯发出微弱的光。而门外却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谈笑。

进门后,班长刘婧倚着木桌,眼七斜斜地望着她们。张校小心翼翼地瞄见她手里的那套试卷,微红的眼透露着疲惫与紧张。“这次考试最后一名,蹲下!”话音刚落,张校便向前踢出了右脚,扎实地坐在脚跟上;腰杆挺得笔直,下巴朝着刘婧的方向高高扬起,有种说不出的倔强。可她再怎么倔也拧不过刘婧,毕竟荣誉室架子上那些奖杯可不是吹来的,是刘婧用一次次话务比武的第一名真枪真刀拼出来的!看着张校圆睁发红的眼睛,刘婧把最上面那张试卷从长满茧子的指缝间抽出来甩到地上,“哼”了一声便不再多说。那卷子上有一行龙飞凤舞的批语:这水平还想值机?错一个抄十遍。落款“么么”,是刘婧的工号。张校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,视线逐渐模糊。

这天是周六外出日,可张校却翻起了笔记。都说笨鸟先飞,要想早值机,她这只笨鸟必须付出更多努力。她悄悄溜出排房来到走廊,找出那张试卷,嘴里念叨着那个她抄了几十遍的号码,眼睛却有意无意地扫着那些穿着便装的女兵。

突然门把手发出“吱呀”一声,门被推开。原来是小可,她的两根头发被风鼓在耳侧,像是小马驹的耳朵。小可飞快地跑向电梯口,边询问假条边喊道:“刘婧班长,电梯关了!”当她看到不远处的张校正痴痴地望向她时,慌忙装着没看见。

对于外出出名,张校心里早有准备,只不过当听到“刘婧”两个字时心里还是泛起一阵波动。她刚猫着腰躲到墙后,就瞥见几乎是冲出排房的刘婧。小可你说,这最后一次外出了,该买啥?”话还没等到回答,电梯门就关上了,张校便皱着眉毛继续背起号码。

转眼间,话务班迎来了年中考核。张校端坐在机台前,两只手像握鸡蛋似的摆在键盘上,嘴皮小幅度地一开一合默念着值班动态。门被推开,一群人陆续涌进机房。当看到刘婧和排长分别坐在左右两侧时,张校觉得心快跳出来了。白炽灯照得人昏昏沉沉,张校感觉有无数双眼睛正盯着她。

如果将机房比作战场,那么当来电铃声响起便意味战争一触即发,一团团错综复杂的电线将交战推向高潮。为了把仗打得漂亮,每名话务员临阵前都必须经过手、脑、口、耳的训练,方能披上铠甲,接受淬火洗礼。张校调整呼吸,很快便进入状态。从拍下电话到应答用户,这短短不到3秒钟的时间里,最能体现话务员“交叉操作”的能力。虽隔着话务器,但张校始终微笑着上线应答。

正当一切进行得顺利时,张校忽然愣住了。她靠在椅背上,手指在键盘上急促摩擦着,却没有发觉自己已经完全将椅子坐满。她吸了一口气,紧接着利落落地敲出一串号码,那个她前后抄了至少上百遍的首长号码。她本以为自己会以这个电话完美地结束考试,却感到背后生出火辣辣的疼。张校下意识转过身,看到一屋子人包括排长在内全都笔挺地坐在椅子一角。她的脸“唰”地红了,脑海里全是话务员准则和站里一直以来的要求:话务员作业,就座时不应超过椅子前三分之一,上半身直立,两腿垂直于地面……张校摘下耳机,艰难地从嘴里挤出“谢谢排长,谢谢班长”几个字,便平静地关上门离开机房。

这次考试过后,张校比之前更喜欢待在角落,除了平日迎面而来而不喜欢不表达的礼节礼貌外,她总是避开人群。这天晚上的哨音格外长,熄灯后,张校一个人在活动室发呆,竟被墙角里冒出来的一只灰蛾扰乱了思绪。她看着它努力飞往高处,可那单薄的翅膀根本承受不住身体的重量,渐渐地越飞越低,最后竟在朝天在地上扑腾起来。看到这一幕,张校竟流起眼泪。这一哭,鼻涕也跟着流,她只好伸手去桌洞里掏纸巾,却不料被一本硬硬的东西砸了手。她顾不上疼痛,一把拽住继而暴躁地摔到桌上,这才发现原来是一本日历。

打开日历,她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因为她看到一张自己和刘婧的小照片被贴在扉页。当那行用艺术字标注的退伍倒计时日期映入眼时,张校彻底呆了。

这时,活动室外传来压抑的咳嗽声,接着是更加低沉的呢喃:张排,我退伍之前,张校这孩子值机是没大问题,你看这次……

门的这一侧,张校蹲在地上,任由泪水尽情流淌。



长征

第5632期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第一次看到那张合影时,我就被上面的文字吸引了。照片上标注着:1937年特区妇女学校全体干部于云岩摄。云岩镇属于延安,这大概是延安时期在云岩创办的一所妇女学校。按时间一推算,我的心颤动起来——这可是刚刚经过长征的红军,他们脚跟一着地就开始办起了教育,而且它诞生的时间比1939年党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还要早。

泛黄的照片上约40余人,男女干部差不多各一半。由于照片表面磨损,不少人的相貌已模糊不清。传给我这张照片的老人,自称是其中一对夫妻干部的儿子。他说,照片是父母亲的遗物,父亲叫伍桂盛,母亲叫张仕南,那年父亲26岁,母亲21岁。照片中,伍桂盛身穿八路军冬季服装,眉宇间透着久经沙场的淡定沉稳。张仕南站在他的身后,短发齐耳,一袭戎装,英姿勃发。

老人是福建长汀人,那里也是我的故乡,于是我立即赶回长汀。一路上,我都在想这一对在长征中结成伴侣的夫妻会有怎样的故事。

按照老人的指引,我乘车来到长汀县古城镇。湛蓝的天空下,连绵起伏的群山高远无限。在龙田墩自然村一座靠山的老屋前,池塘里的浮萍像一块碧绿的巨毯,一朵朵蓝色的花儿争先恐后开满了水面。热情的村支书介绍,这座老屋就是伍桂盛和张仕南夫妻当年亲手建造的家。虽然荒芜日久,木质结构的色泽也暗淡不少,但从整洁的陈设和细腻的水工活看,这对夫妻为它倾注了浓浓的爱意和美好的期许。

老人的妻子说:“我婆婆操着一口四川腔的普通话,是个干净利索的人,说话做事也从拖泥带水,人看起来

烽火征程雁双飞

■王坚



也清清爽爽的。她模仿能力很强,在古城生活久了,学会了讲古城方言。婆婆说她小时候缠过小脚,后来去学校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,就扔掉裹脚布,瞒着家人去参加苏维埃的少先队。天天唱着山歌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,后来她自己也参军,在红军医院当看护员、护士长,跟着部队完整地走完了长征。”

老人接过去:“父亲是1911年出生的,在他很小的时候爷爷就病逝了,父亲和奶奶相依为命。父亲是家中的独苗,奶奶从牙缝里挤出粮食供父亲读了半年私塾。1929年底,父亲参加了古城暴动,因为力量对比悬殊,暴动队被包

围后遭受重大损失。父亲拼死突围后,隐蔽在高山密林。1930年初,父亲和家乡的暴动队员被编入红四军,配合红四军四处征战。后又调到新组建的红军第二军。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,父亲调入红一军团教导营任某连指导员,参加了长征。父亲和母亲的相识,就是在长征路上。一次,部队过铁索桥,担任看护员的母亲为抢救红军伤员险些掉下铁索桥。千钧一发之际,父亲靠着敏捷的身手,把失去平衡的母亲一把拉回桥上。”

缘分是奇妙的,两位革命战士在一座桥上、在一刹那间连结起彼此的生命。但身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,两人暂时将个人情愫掩藏,约定胜利后相见,便加快了翻山越岭的脚步。

“母亲说过草地时没有吃的,常常啃树皮、吃牛皮腰带,过沼泽地时一排队人拉着手才敢走。有一次打仗时,首长带头冲锋,敌人的机枪凶猛扫射,父亲不顾一切扑在首长身上,子弹从他的右大腿穿过,骨头都被打碎了。他告诉我,自己要去陕北红军后方医院休养,可匆忙之中还是没能找到母亲,只好先行离开大部队。”说到这里,父亲揪起来,替他们捏了一把汗。